

研究現代漢語方言的重要意義

周祖謨

漢語從很古的時代起就有方言的差異，聲音既殊，詞語也互有不同，直到現在各處語言仍有不同的差別。北方話流行的區域固然很廣，但是各地還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點。至于其他幾個大的方言區域，如吳語、閩語、湘語、皖語、贛語、粵語、客家語等，語音、詞匯、語法幾方面都各有其特殊性，難以互相理解。就是屬於閩語一系，閩北與閩南也不一致。

這些不同的方言，有的外國人認為是不同的語言，那是錯誤的。因為這些不同的方言的語法結構與普通話基本是一致的，語音系統都與中古音可以互相對照，詞匯也不過是叫名兒和說法上間或不同，而基本詞匯仍然是一致的。所以不能說是不同的語言。可是我們要問為甚麼這些地方方言會出現這些差異呢？這裏將會有兩種因素：①漢語歷史極為悠久，這些方言各有其發展的歷史，由於時間先后不同，社會經濟與地理風習不同，以致逐漸發生歧異；②這些方言與其他少數民族語言不能沒有融合的地方，有融合就會產生一些音的變化和增加一些特殊的詞匯。既然漢語有這些不同的地方方言，為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和加速社會各方面的建設，就必須大力推廣普通話，並從事各地方言的研究，比較方言與普通話的異同，使全國人民都能以普通話作為共同的交際語言。這是極其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就普通話而論，它固然是從北方方言的基礎發展起來的，試問我們對北方方言是不是有了全面的了解呢？那却不然。北方方言地區範圍很大。北方幾省在語音、詞匯和構詞法上都不是完全一致的，既有古語之遺，又有很多特殊的情況。例如陝西說“正南”就叫“端南”，山西有些地方還保存入聲，晉南說“牆”叫“厖”，諸如此類，就很值得我們注意。北方方言裏有不少語義鮮明，通行面較廣，而為現代語詞典所不收的詞，應當搜集在一起，以豐富普通話的詞匯。語言跟人的社會生活是息息相關的，每個人都應當注意語言的研究，特別是專門從事語言研究工作的人，更應當努力以赴。

在語言學裏，方言學只是其中的一門，但在漢語各方面的研究工作中，方言的研究却極其重要。因為研究現代漢語方言，不單純是為了便於推廣普通話，從發展語言科學方面着想，還有更多的重要意義。我認為至少有這樣幾方面：

1. 有助於漢語歷史的研究；

2. 豐富普通語言學的理論；
3. 爲編輯漢語大詞典提供現代話語言的依據。

語言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包括：現代語的研究，歷史的研究，本民族語與外族語言關係的研究，世界各種語言的結構和發展的研究等等。單就研究漢語來說，要從事歷史的研究，首先要從了解現代語入手。現代語是通曉古代語的一個關鍵。儘管我們有極豐富的歷史資料，但是單憑仗歷史資料還是不夠的。比如我們讀古代的散文，所以能夠讀得懂，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有現代語的基礎作憑藉。儘管語言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經有過很多變遷，可是基本詞匯和主要的語法結構依然不變。因此，古語與今語是相聯繫着的。不知今就不能知古。惟其能相互比較，即同以求異，才能由今語以通古語。要研究漢語的歷史，就要研究現代的方言。

現代的方言都是從古代語經歷不同的時期分化發展而來的。語言分化出不同的方言，是與社會的發展、政治的變動、人民活動的範圍、社會經濟的往來等各方面相聯繫着的。方言的本身，自有其發展的歷史，但在不同方面都會保留着不少古代語所有的東西。也許某些方言保留的比較多一些，而另一些方言保留的少一些，情況雖有不同，但都是同一種語言的分支。所以，或據今以證古，或據古以通今，都要對今日的方言有充分的全面了解。

就以語音而論，清代的江永和陳澧二人所以能通曉《廣韻》的聲韻系統和宋人的“字母”、“等韻”之學，這跟他們自己的方音保留古音成分比較多有關係。江永是歙縣人，陳澧是番禺人。歙縣在安徽黃山東南，跨新安江，與浙江接近；番禺即廣州；兩地辨音最細，都有入聲。現在我們能進一步理解《切韻》音系的讀音，也正是借重於現代各地的方音。清人錢大昕講《舌頭類隔之說不可信》，是根據歷史的資料獲得的結論，而我們現在又能進一步從閩南方言中找到可靠的根據以與歷史資料相證驗。這都是據今可以證古的明顯事例。又古人分別漢字聲調爲四，即平上去入。實際的調值我們已經不知道。現代方言讀字，音調各異，四聲分別陰陽，清聲母讀陰調，濁聲母讀陽調，聲母與調類發生關係。這件事一定起源很早。今日方言的讀音，在調類上可以與韻書所注字音的清濁相應照。這就是可以據古以證今。

談到詞匯和語法也是如此。方言詞匯的比較研究，遠在漢代楊雄作《方言》時就已經注意到了。他覺察到要了解古代傳流下來的一些詞語的意義應當從實際存在於方言中的詞去探討。因而他記錄了很多不同方言的詞語，分別詞義的異同，辨別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哪些是漢代當時的通語，哪些是方言，哪些是古雅的別語。根據這樣的記錄，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古與今的關係，方言與通語的關係和語詞在方言中聲韻轉變的關係。後來晉代的郭璞爲《方言》作注，又兼錄不少晉代的方言詞語，並且特別注出讀音，古今相互比證，爲詞匯的研究創通了一條新路。可惜後來沒有更突出，並符合現代科學精神的著作出現。

詞匯是隨時代而不斷發展的，不用的舊詞逐漸消亡，而又陸續產生新詞。可是我們從書本上見到的詞匯有些不太理解，往往以爲是已經消失了的舊詞，其實在現代的方言

裏可能依然存在，很多是由於漢字的障礙因而我們不能理解。因為古人寫出來的字跟我們現在寫的字不同，古人沒有拼音符號作工具來注音，所注的反切用今音讀又跟現代口語的讀音不同，這樣也就容易被我們誤認為是已經死去的詞了。

詞匯方面的問題很複雜。要明瞭古人應用過的詞語的涵義，例如南北朝至唐宋時期字書、韻書中所記載的一些雙音詞和宋元明小說戲曲中所出現的一些特殊詞，恐怕不能不從現代的方言裏去找。要了解漢語詞匯發展的全貌，特別是構詞法，更不能拋去方言而不顧。所以我認為研究現代方言的詞匯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們在這方面所作的工作還很少。過去西方的傳教士雖然寫過一些關於漢語地方方言的書，如上海、廈門、四川、內蒙等地方言。但是缺乏現代語言學的知識，價值不大，尤其是與漢語歷史的研究無關。

研究詞匯，不能局限於記錄一地一處的方言，更重要的是應作主要地區方言詞匯的比較研究。方言詞匯的比較研究的重要意義不僅有助於發展語言科學，同時對豐富文學作品的語言也會有所裨益。文字寫得簡潔、生動、準確，是要有足夠的語言修養的，但是在用詞上也會隨體裁的不同而有差別。例如小說、劇本是不是在純潔、健康而又具有普遍性的原則下用一些方言詞語呢？怎樣取舍，也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

另外，方言詞匯的比較研究對於了解社會發展和人民遷徙的歷史也是有幫助的。例如大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從公元三世紀以後隨着政治、經濟、文化的推移，語言的交錯往來非常頻繁。今天有些不同區域的方言所用的詞匯彼此很接近，由此可以看出在歷史上人民活動的情況。像江西的西南部吉安、泰和、贛州一帶；湖南的南部衡陽以南和四川的南部，有些地方的詞匯特別接近，這與商業經濟有關係。這種現象當然不是一代兩代的問題。為甚麼如此，就需要探討。

關於語音、詞匯我們說了一些，下面說一說語法。語法是語言中最穩定的東西，可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語法也有改變，儘管很遲緩。現代方言的語法結構可以說基本上都跟古代語法相近，而閩語和粵語保留的古漢語的文語成分更多一些，可以跟文言語法相印證。自《馬氏文通》以來，學者對於古代文言語法的研究已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對於古代語體文字的語法研究還沒有展開。例如唐、宋僧人的語錄和宋代程朱學派的語錄，必然與口語比較接近，但有些句法、虛詞、語助等跟現代普通話就頗有不同；猜想在現代南方方言裏不能沒有遺跡可尋。因為我們知道，在某一時期之內，表示同一意念時，常有兩種平行的不同的語法形式，但經過一段時間的選擇，一種行開了，另一種不用了，而在後代的方言中也許還有其遺跡。所以我們能廣泛地研究現代方言的語法還是必要的，從中我們還會有很多新的發現。

因此，要從事漢語歷史的研究，就必須以書本的資料與實際方言中的資料相結合，才能有更大的成就。

就目前情況來看，近五十年來，我們雖然有了一些極有貢獻的關於現代方言的論述和極有價值的十幾種方言的調查報告，可是大都側重於語音的描寫或歷史音韻的對比，在詞匯和語法方面還缺乏專門的著述。全中國還有很多方言一直沒有接觸到。就以北方話而論，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做過詳盡的調查。雖然對陝西、河北的個別地點有過一些精

細的研究，可是我們還應當擴大範圍，做全國各省普遍的調查研究。不同的省分在語言中不僅會保留很多古語成分，而且方言土語中還會或多或少保留一些從外族語言借來的語詞。有些方言還具有構詞上的特別附加成分，都值得我們注意。

總之，研究現代個別地區或地點的方言是一項基本的工作，但同時還必須在個別地區或地點方言研究的基礎上做全面的綜合性的比較研究。在綜合比較研究中我們可以了解很多語音轉換的規律和構詞的多種方式；還可以從語言的共同點上去看過去人民往來的跡和方言與方言融合或分化的歷史。這些都有助於理解漢語發展的歷史。

經過全面的包括語音、詞匯、語法各方面的綜合研究之後，我們的知識面擴大了，與其他社會科學的聯繫增多了，必然可以促使我國語言科學的發展向前跨進一大步。既能給歷史的研究以直接參證資料，又可以明確指出現代漢語方言的體系，劃出方言地圖，以利於推廣普通話。無疑問，推廣普通話和方言的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同時，由於有了新的歷史研究跟平面研究兩方面的豐富成果，對普通話語言學的理論會有多方面的貢獻。如語言的分化與統一，語言的融合，方言與共同語的關係，方言的形成及其與社會、經濟、政治、地理、人民活動的關係，語音轉換的一般規律，語詞和語義的發展，語法從分歧到集中，從簡單到繁複的過程等等。

另外，從目前我們編輯詞典的實際工作出發，現代方言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編纂的是一部現代語的詞典，就有一個對方言詞匯的處理問題和漢字應當怎樣寫的問題。談到現代漢語，自然不能舍去方言不論。為適應語言研究的需要，方言詞典仍然是要編的。編輯方言詞典包括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書本材料的積累，一是進行實際的調查。以前各省的地方志一般都有方言志，詳略不等。有的志書編輯得很好，例如廣東的《肇慶府志》，足資參考。以前各地還有些本地的字書和雜字書，一向不為人所重視，現在都應當盡力搜集在一起。搜集資料，累積資料，在編輯字典和詞典的工作中極為重要。資料不完備，掛一漏萬，固不允許；就是偏畸不全，也難以使用。書本的資料已全，還要進行實際調查，辨音辨義，用科學方法加以編錄整理。對舊日書本的資料還要分別古今，有所取舍，不宜兼包並蓄。

還有，我們從事現代方言的研究，在編輯歷史大字典和大詞典時就可以利用方言把字義和詞義解釋得更明確些。清代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就在這方面很用心。近代章炳麟著《新方言》，着重於通古今之郵，以今方言釋古語詞。其中有些解釋比較好，有些泛用聲音通轉，則不免近於牽強附會。不過從中我們也可以得到一些啓發。我相信在有了方言詞典以後，我們會精進一步。

廣泛地進行漢語方言調查工作既然有此必要，現在就應當及時去做。因為語言是與社會的發展相聯繫着的，社會的經濟、文化不斷有所改變，方言也在不斷消失，所以必須及早着手才行。從事語言研究工作的人必然都體會到研究方言的重要意義。調查方言也是了解有關語言的全面知識的最好門徑。一個語言工作者不從事實際語言的調查研究，是不會理解語言的全貌的，也不可能學好語言學。古人說：“譬如爲山，成于一置。”如果我們能有步驟地去調查各地方言，期之三年，必有所成。我國的語言科學必將有新的發展。這就是我們的責任！